



Pulitzer Prize Winners in Journalism

19 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 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

詹姆斯·赖斯顿

新闻与正义

II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



Journalism and Justice

*Pulitzer Prize Winning
Articles in Journalism*

Volume II

〔美〕 沃尔特·李普曼 / 詹姆斯·赖斯顿 等著

展江 / 主译评

海南出版社

Journalism and Justice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

(1917-1997)

〔美〕沃尔特·李普曼 / 詹姆斯·赖斯顿 等著

展江 / 主译评

海南出版社

1998.2

新闻与正义

II



Journalism and Justice
Pulitzer Prize Winning
Articles in Journalism
Volume I、II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全文或部分转载
本书文字。本社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敬请
读者认明海南出版社版《新闻与正义——普利
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系列。

“ ” “ ”

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获奖作品集
主译评:展江 责任编辑:万胜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33
字数:700千 印数:0001-8000套

ISBN 7-80645-032-7/I·3
定价人民币:49.80元(I、II册)

Pulitzer Prize in Journalism



一年一度的普利策新闻奖颁奖，如今已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一大盛事，要全面认识普利策新闻奖的价值，单从评选本身和作品新闻业务技巧的角度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作品（文本）鉴赏、相关新闻历史背景和其中的新闻精神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一目的。

《新闻与正义》一书是目前国内首部全面介绍普利策新闻奖作品的著作，全书以译介获奖作品为重点，并通过作品新闻背景加以论述与赏析，是我国新闻工作者及广大读者学习新闻写作、了解本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难得的教材。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约瑟夫·普利策

Joseph Pulitzer



战争压力与杀戮者的产生(1969) (War Strains and the Production of Killers)

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

〔新闻背景〕

西摩·赫什,1937年4月8日生于芝加哥。1958年入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60年代先后在合众社和美联社担任记者。1966年任美联社驻五角大楼记者。后因万余字的生物战报道被删至1700字而辞去美联社的工作。1969年,已成为自由撰稿人的西摩·赫什从五角大楼的一个熟人那里得知美军在越南战场一个叫平克维尔(越南称为美莱)的村子屠杀无辜平民的惊人消息。赫什决心着手调查这一重大新闻。他说服了一个基金会为他出资进行调查。报道一刊出就震动全国,36家报纸转载了他的文章。普利策奖委员会因其“对美莱事件的揭露”而授予赫什国际报道奖。后来赫什成为《纽约时报》出色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他曾揭露美国在1970年前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以及中央情报局对至少10'000名美国公民建立秘密档案等内幕。1979年3月,他离开《纽约时报》,写作一本关于亨利·基辛格及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任职的书。该书已出中译本,名为《权力的代价》。1983—1986年赫什任《大西洋月刊》全国记者,1993年起任《纽约时报杂志》记者。(1970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圣路易斯邮讯报》1969年12月2日

上尉厄内斯特·梅迪纳连队的一位前成员,在今天被公开的一封信中写道,在美莱事件发生的两天以前,这个部队里的一些人已经成了“野兽”,他们殴打儿童并且践踏一个友善的农妇致死。“这种事怎么会以上帝的名义发生呢?”格雷戈里·奥尔森,这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20岁的中士在1968年3月14日寄给他父亲的信中这样问道。“所有这些看起来挺正常的人,其中一些还是我们的朋友,在某个时候却象野兽。”

据报道,当美莱事件发生时,梅迪纳是第11轻步兵旅第21步兵团,第1营C连连长。据参与者和目击者说,梅迪纳的连队3月16日,星期六,在广义东北6英里的平克维尔长驱直入,故意杀死了37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军队指控奥尔森的排长、来自迈阿密的26岁的小威廉·卡利中尉在此事件中杀死了109名越南平民。这个排的另一人、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圣弗朗西斯维尔的戴维·米切尔因蓄意谋杀正在接受调查。

奥尔森在信中还写道,附近一枚炮弹爆炸,排里一人被炸死、4人受重伤后,他们杀死了一个越南妇女。这封用军用铅笔写的信字迹潦草,信往下写道:“当回‘据点’时(据点是这个连在平克维尔的给养基地),他们看到一个妇女在田里劳动。他们开枪打伤了她,然后一直把她踢死,并向她的头部发射弹火。他们袭击遇到的每一个小孩,这是屠杀,我为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感到羞耻。这不是第一次,爸爸,我以前已经看到过很多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全部告诉你,我想我只是想倾诉胸中郁积的这一切。”

奥尔森在平克维尔时刚刚19岁,是一个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高个方脸的年轻人。他是一个摩门教徒,而且像大多数教堂里的人一样,深信应保卫他的祖国不受侵犯。他没有参与美莱的屠杀。“当其他人向人群开枪时,我打死一头猪和一只小鸡,”他在接受采

访时说(他仍在军队中服役)，“我得到的唯一命令是杀死敌人，我心里清楚谁是敌人。”

在平克维尔和此前发生的事严重动摇了奥尔森对于上帝和人的信念。他在寄到父亲办公室的信中写道：“我已经完全不相信我的这些伙伴了。我只希望时间快点过去，我只想回家。我确实相信，正如您说的，爸爸，所有这一切背后有一个原因，如果是上帝的意志让我去，我愿呆在这儿而不是迅速溜回家。”

梅迪纳连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奥尔森相信是连队里的道德和纪律败坏。在许多次采访中的一次，他说：“我们梅迪纳连，似乎总是派到肮脏的活儿，道德水准极度低下，每个人都感到我们正在做错事。”没有一个军官或未授军衔的官员试图惩罚犯错和犯罪的人。而且许多目击者揭发，到平克维尔的任务下达时为止，许多目击者揭发，连队成员已参与了多起强奸和屠杀。奥尔森信中所描述的在此前和此后的采访中得到了本连至少3个人的证实。特里说，当地村民向附近的政府官员抗议此事。“村里的人总是被杀死，”他继续说，“但没有采取任何举措。”这是平克维尔事件的序幕。

奥尔森仍然相信，并没有直接的命令要毁坏村子和杀死居民，像众所周知的越战中山美事件那样。如同部队里的其他人告诉记者的那样，他仔细回忆起前一天晚上连里开会的每一细节。会上梅迪纳概括讲了这次任务。这是奥尔森的叙述：“梅迪纳的确说了——他的确说——我们有理由报复和扯平(他指的是前天的炸弹事件)。他确实告诉我们说，要到那儿去破坏食物供给和村庄。他告诉我们，他们(村民们)全都是越共的支持者。他要我们向敌人射击，也向任何逃离我们、躲着我们的人或看起来像敌人的人射击。他绝对没有说过要杀死所有人。如果他说过‘屠杀平民’，我一定会记得……一些人问‘谁是敌人’？梅迪纳解释说，如果一个人奔跑，就要向他开枪；有时即使是一个携带步枪的女人，如果奔

跑,也向她射击。他的确停下来解释过谁是敌人。”

奥尔森说,他确信这只是“错误的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事件……我知道的,那些开枪者都不是最坚定的人。它(这次事件)是一场自发的不理智行动……一旦我们到了那儿,我认为梅迪纳并不能阻止它发生。任务完成时,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敌军对这次攻击早有提防,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就溜走了。

为什么奥尔森没有参与射击呢?“我觉得这有一些像屠杀……一旦我明白在发生什么,我相信自己不能这么干——即使受到指责。”正如奥尔森所说,他被卡利派去掌管机枪,不再要求直接参与射击。“但是就一个像保罗·米德罗(米德罗上周承认至少打死了35个平民)那样的小伙子来说,他对自己并不十分确信。他的感情战胜了理智。”尽管米德罗称,射击时他感觉良好,但奥尔森说,那天夜里这个年轻人哭了。

奥尔森说他把信寄到父亲的办公室,因为他不想让母亲看到。他父亲萨姆·奥尔森说,他让妻子读了信。“我们在他走后很清楚,这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所有上述的采访都是在本宁堡^①卡利案审判前进行的,该审判禁止可能的目击者就平克维尔事件公开发表看法)。

(李子阳 译)

^① 本宁堡位于佐治亚州西部城市哥伦布附近,该地有美国最大的军校陆军步兵学校。1970年11月,卡利受到军法审判,次年3月被判无期徒刑,后减为20年监禁。

狂野之夜(1969) (A Wild Night)

汤姆·菲茨帕特里克(Tom Fitzpatrick)

〔新闻背景〕

汤姆·菲茨帕特里克,1927年2月2日生于纽约。先后在《芝加哥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和《克里夫兰实话报》任记者。1969年任《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专栏作家。

1969年10月8日,菲茨帕特里克遇到了一起爆炸性事件,一个叫“气象预报员”的极左组织在芝加哥发起了为期4天的破坏活动。菲茨帕特里克用第二人称,而不是传统的第一或第三人称写出了他的目击报道,将读者带入了那一夜的叙事之中。(1970年普利策地方一般报道奖)

《芝加哥太阳时报》1969年10月9日

巴德·马文站在林肯公园的长凳边他自己燃起的火堆面前已足足有30分钟,他对人群喊叫,警告他们他有多么坏。

现在是晚上10时25分……大约200个年轻人开始冲出公园,冲向芝加哥历史协会。巴德·马文也开始奔跑,右手挥舞着一块燃烧的长条木板。

“切^①万岁，”他奔跑时不断叫喊。“古巴万岁。”

“让战争回家，”一个女孩跑在他身边，尖叫着。

为了跟上队伍，她在黑暗中不慎撞在历史协会外的一棵大树上，这是今晚的第一桩意外。

到现在为止，这群人的主力已到达北方联邦储蓄所，它位于北部和克拉克街的西北角。这是一座巨大而壮观的建筑，有着大玻璃窗。人群停在这里。

一个戴着白色头盔的又高又瘦的年轻人跑到人群的前面，向着大玻璃窗扔石块。第一块，紧接着第二块、第三块，然后是欢呼。

现在每个人都用最大的劲喊叫，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这么多人从公园里跑出来时手里拿着石块。

“胡、胡、胡志明！”他们在高喊。前排的一名金发女郎挥舞着越共旗帜。

从克拉克大街向南行进，这些人已经占领了整条街道。街道窄得足以在一侧窗户爆炸时引起回声。

三块石头扔进红星小旅店的窗户，公寓四边的窗子都震破了。击碎玻璃的声音像电击一样震动着这群人中的每一个。当你在这样一个团体中，你不会孤单。从现在开始，已经走上野蛮之旅。如果你想发现发生了什么事，就跟着他们好了。

到此刻为止，你已经学会一个重要原则来跟上这些扔石块的暴徒。你得呆在前面，在街上同他们在一起。

如果你上了人行道，就永远也不会有石块扔向你，而是扔进公寓的窗子，这里也得冒险。因为你必须算好行动时间以便在看到警察出现时能离开这全班人马。

没有出现警察。狂热的队伍往前又走了50码。前方迪维森大街的警察正严阵以待。

^① 切·格瓦拉(1928—1967)，古巴革命领导人，1967年在玻利维亚遇害。

他们排列在街道上，一言不发。这阵势十分怕人，你无法责怪这些年轻人，他们转身就跑，跑回克拉克大街后又在戈瑟向东拐，逃走了。

戈瑟是真正遭到破坏的一个地方。每一辆轿车的车窗都被砸得粉碎。迪尔伯恩和戈瑟拐角处一座高层公寓的走廊玻璃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这些人虽然知道这已经差不多了，但他们还是继续袭击行动。

现在，当我们到迪维森大街时，我看到了一件挺精采的事：巴德·马文那个拿着燃着火焰的木板吹牛说他有多坏的人，正在逃跑，手中的火炬也熄灭了。

看到这些难管教的年轻人屈服总是令人高兴的，但是现在发生的事急转而下。所有被公园里的煽动言辞所刺激的那些年轻人突然心血来潮。

“冲啊！”一个小伙子尖叫着冲向警察队列。“冲啊！”十几个人跟着冲过来。

十字路口停着一排汽车。这些年轻人被尽可能快地扔进了车。一个警察倚在一辆车旁边托着他的头。他刚才被一块石头击中，流着血，他很恼火。

但是这些年轻人还不停手。一些人向东到湖岸车道。另一群人转回去沿着迪维森大街向西跑去。

这是首次冲突。你还会在不同路口看到三次以上的冲突，直到在北边，韦尔斯西面的克里利街。只剩下大约 50 个人了。这时才令人恐慌呢。

走在街道中间，你会惊讶地看到汽车迎面向你冲过来，好像要把你撞翻。车上装满了警察，一些人穿着便服，一些人身穿制服。

当他们从车上跳出来时，你可以看到至少 3 个警察拔出了手枪，其他人挥舞着棍棒。

那些年轻人想跑但没有机会。一晚上他们都在渴望对抗，现

在对抗开始了。

几分钟之内,街道就被肃清。副警长詹姆斯·罗奇福德朝警官詹姆斯·克拉克走过去,以得知最后的报告。但罗奇福德的脸上没有一丝胜利的微笑。196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他就经历过同样的事,那一次他也没有感到一点快慰。

“好了,”罗奇福德对克拉克说。“街道肃清了,我们也该走了。”

(李予阳 译)

一个恐怖分子的成长(1970) (The Making of a Terrorist)

露辛达·弗兰克斯/托马斯·鲍尔斯
(Lulinda Franks/Thomas Powers)

〔新闻背景〕

露辛达·弗兰克斯,1946年7月16日生于芝加哥,1968年获瓦萨学院文学学士学位。1968—1972年任合众国际社驻伦敦记者,1973—1974年任该社驻纽约记者。1974—1977任《纽约时报》记者。1977—1982年成为自由撰稿人。1983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新闻学课程。

托马斯·鲍尔斯,1940年12月12日生于纽约,1964年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65—1967年任意大利英文报纸《罗马美国人日报》记者。1967—1970年任合众国际社记者。此后成为作家。

1970年3月,一名家境富裕的女青年在一场爆炸事件中殒命。经调查,这位名叫戴安娜·奥顿的女子学院毕业生是极左恐怖组织“气象预报员”的重要成员。弗兰克斯和鲍尔斯多次采访了戴安娜的亲友,用12,000个单词的篇幅描述了这名恐怖分子不为人知的一面。以下是这组系列报道中的第一篇,它为整个系列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为故事的展开搭好了戏台。(1971年普利策全国报道奖)

合众国际社 1970 年 9 月 15 日

1970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当 28 岁的戴安娜·奥顿在伊利诺斯州德怀特下葬之时,聚集在她墓边的亲友们并不真正知道她究竟是什么人。

主持葬仪的牧师在祷文中将戴安娜的死解释成时代的暴力事件的一部分,但是全部的真相并不那么简单。

报纸提供了事情的梗概。戴安娜·奥顿和两个年轻人 3 月 6 日在一次炸弹爆炸中丧生,那次事件毁掉了格林威治村的一所邸宅。两个年轻妇女从崩塌中的房屋中跑出来的消失了。警察花了 4 天时间才在碎砖瓦砾底下找到了戴安娜的尸体,又花了一个星期才得以确认。

戴安娜等人是一个通称为“气象预报员”的暴力革命组织中的成员。他们已经把这所房子变成了一个“炸弹工厂”,这是警察的说法。几个月之后,他们都因牵涉到一桩指控而被法庭传讯。他们的运动是要毁灭美国社会,阴谋的一部分就是炸毁警察、军队和其他上层建筑。

事实清楚无误,但是德怀特镇上的人们(3,086 人)没法把这些和他们记忆中的戴安娜联系起来,她的家庭也有自己的回忆。

戴安娜始终不渝地热爱她的家庭。但是,出于偶然杀死她的那颗炸弹原本是设计出来杀死他们和他们这一类的人。她为之献身的革命将夺去她父亲的广袤的农场,将他的银行炸成碎片,并在一瞬间毁掉花了一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名誉和地位。

戴安娜成长的世界是一个由宽敞优雅的邸宅、经过修剪的草坪、最好的学校和显赫富有的祖系所组成的世界。

戴安娜伟大的祖先中,有一个创建了美国童子军;另一个建立了基利研究所——第一个把酗酒者的状况作为疾病加以治疗的地方。她的父亲,詹姆斯·奥顿,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生,从 1964 年到 1966 年一直在伊利诺斯州立法机关供职。他的财产使他成为

这个州最富有的人之一，包括6'000英亩的大麦和黄豆、100头牛、好几处农舍，一家旅馆和位于德怀特的家族银行的部分所有权。

戴安娜生于1942年1月26日，出生在她的家族闻名已久的一个城镇里。奥顿家族铺设了德怀特的街道，修建了自来水厂，还为修建学校提供了土地。

戴安娜就像一个农场姑娘、女猎手和一个马背上的女人一样成长起来。她是家里最好的射手，在农忙时能驾驶拖拉机，是当地的四健会^①的一个活跃成员。有一次，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发现一只死鸟并被告知它不可能再复生，她一连哭了好几个钟头。

她和她的3个妹妹关系亲密。卡罗尔，今年26岁，是一个电视撰稿人；帕米拉，一个24岁的家庭主妇；德博拉，17岁，弗吉尼亚州格林韦的马德拉中学高年级生，那是戴安娜也上过的一个学校。

她的父亲是一个英俊博学的绅士，因为一种遗传病而接近失明。她的母亲简，高高的个子，和蔼可亲，喜欢在吃晚饭时保持活跃的谈话，并且鼓励孩子们在家里讨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内容。

孩提时代，戴安娜温和宽容且乐于助人。“她从不无理取闹或者像很多小孩那样要这要那，”鲁斯·莫尔哈特说，她在家里做厨师和护理21年了。“她只做让她做的事情。”

戴安娜的童年受到庇护，幼年的教养也十分严格。

“奥顿夫妇从不让孩子四处乱跑，”鲁斯说，“戴安娜不允许做许多其他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如果她去什么地方的话，那通常是和她的父母一起。”

她的家族的数百万美元财富使戴安娜感到和她的同学有些不同。他们过去称她为“钱袋小姐”——这是留在她记忆中的一种伤

^① 四健指健脑、健心、健手、健身。

害,她有时会对朋友提起,直到她死去。

一次,刚6岁时,她来到保姆身边说:“鲁西,为什么我们得有钱?”

几年以后,学校里一个住在德怀特穷人区的朋友被她的家庭打发走了,去和其祖母住在一起。戴安娜含着泪水来到父亲身边。“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普普通通?”她问。

当戴安娜长大一些的时候,她对过份华丽的衣服、对梳妆打扮去参加晚会都产生一种厌恶。她不是一个常常索要新东西的孩子,她不开列生日清单。有时,她把她的零花钱给她的妹妹,虽然她们都得到了同样的数目。戴安娜似乎总能在一周结束时有些剩余。

戴安娜的父母是圣公会教徒,但由于德怀特没有圣公会教堂,鲁斯·莫尔哈特就带戴安娜去公理会教堂。她受了坚信礼,但后来慢慢远离了宗教。

14岁时,戴安娜第一次离开德怀特,在马德拉学校完成中学学业,在那儿她和出身富有的名门望族的女孩混在一起,高兴地做着—个马德拉的女孩做的一切事情。在她四年级时,她被全部七姐妹^①录取了,并决定去布林莫尔学院^②上学。

当戴安娜在1959年的秋天,来到布林莫尔时,她是一个高挑清瘦的女孩,有着短短的金发和修长的贵族气的手。作为一名中西部的共和党人,她反对任何带有“自由派”或“大政府”意味的东西。1960年,她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反对约翰·肯尼迪。她热情地捍卫她父亲对亚拉巴马州的租佃农场的所有权。从农场被卖掉以来,她一直坚持认为父亲对佃农是友好而公正的。

在第一年中,戴安娜被认为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总是四处扮

① 指美国最有声望的7所女子学院,包括建于1885年的布林莫尔学院。

②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